

图说犍陀罗文明

孙英刚　何平　著

Illustration of the Gandhara Civilizatio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说犍陀罗文明

Illustration of the Gandhara Civilization

孙英刚 何平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犍陀罗文明 / 孙英刚，何平著.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9.5
ISBN 978-7-108-06560-5

Ⅰ. ①图… Ⅱ. ①孙… ②何… Ⅲ. ①文化史－犍陀罗－通俗读物
Ⅳ. ① K350.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7532 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9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录

001 绪　论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作为佛教飞翔之地的犍陀罗

035 第一章　希腊化时代和犍陀罗文明中的希腊元素

071 第二章　贵霜帝国的王朝艺术

115 第三章　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在犍陀罗的再造

245 第四章　佛像与菩萨像的兴起

309 附　录　大犍陀罗地区大事年表

319 参考文献

绪论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
——作为佛教飞翔之地的犍陀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一历史脉络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一个切入点，任何绕开它来研究东亚文明的尝试都是不全面的。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5—前4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令人奇怪的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国——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派遣僧团到中国分舍利建塔之类的传说，但这些都是后来中国文献的附会。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作为佛教史的学者，也许跟很多相关的学者一样，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脉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人类文明遗产，笔者常常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些感觉很可能不是错觉，而是基于历史常识的判断。其中一个感觉是，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史。很多复杂而重要的历史支脉（甚至是主干），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被抹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讲述的、整整齐齐的故事。

笔者撰写此书的目的，或许是想进行一次恢复历史支脉（甚至主干）的尝试，来解释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属性来源。佛教是人类各种文明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犍陀罗地区经过各种文明融合与再造之后，从一种地方性的信仰一举跃升为一种世界宗教。从这个角度来说，犍陀罗不愧是佛教的飞翔之地。

一　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犍陀罗

犍陀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好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繁荣的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却成为

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其西边是兴都库什山，东北是喀喇昆仑山。东边到印度河，南边是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平原，杰赫勒姆（Jhelum）河流过这里，形成了富饶的平原，造就了繁荣的农业区。贵霜帝国的首都，长期就置于白沙瓦平原上，以“布路沙布逻”或者“弗楼沙”等名字频繁见诸汉文史籍。穿越北部的山脉，就进入了古代的乌仗那地区，以斯瓦特谷地为中心。斯瓦特的犍陀罗浮雕古朴浑厚，很有地方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就是来自这个地区。而穿过西边的兴都库什山，就是古代的那揭国，也就是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位于该地区的醯罗城（Hidda）和那揭罗曷城（Nagarahara）是中土巡礼求法僧人礼拜的重点，从那揭往西北行，在兴都库什山中，就会到达巴米扬（Bamiyan），也就是玄奘笔下的“梵衍那国”。

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了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个地方在汉文史料中以“大夏”闻名，希腊文化在这里繁荣了数百年之久，它也是犍陀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组成的大犍陀罗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数百年间，成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对中国来说，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贯穿此处的丝绸贸易，而是在犍陀罗受到系统佛教训练的僧侣们，怀揣着菩萨的理想和执着，穿越流沙，将佛教传入中土。

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除了作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布逻和位于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还有北边的斯瓦特、位于贝格拉姆（Begram）地区的迦毕试故地、保存众多佛陀圣物的那揭和哈达、汉文文献中提到的乌仗那国（布特卡拉遗址所在地）、马尔丹县的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等等，可谓星光璀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都在犍陀罗的文化和地理范围之内。距离喀布尔很近的艾娜克，以铜矿开采著称，贵霜时期，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日后曾出土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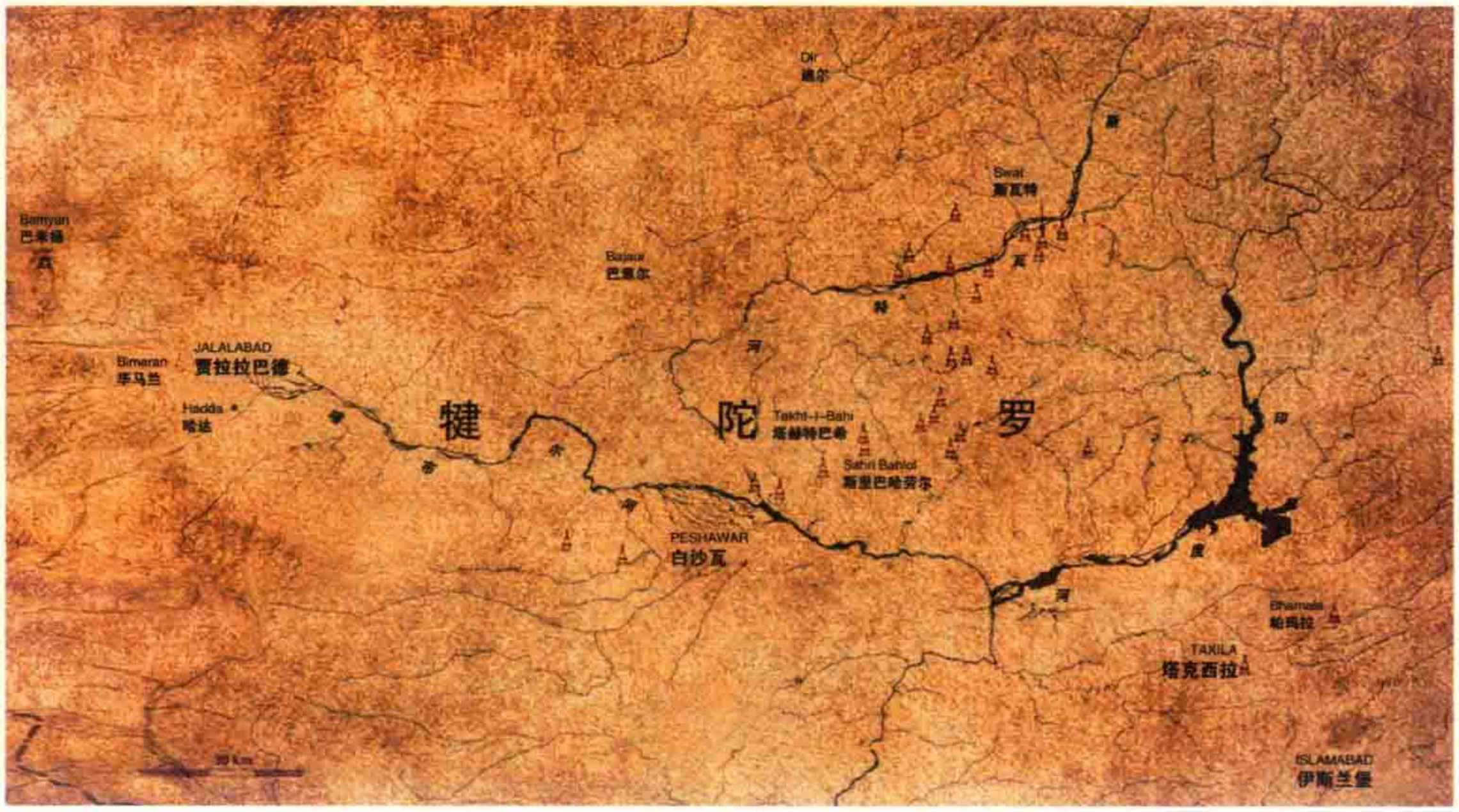


图0-1



图0-2



图0-3

图0-1　古代犍陀罗地区示意图

图0-2　斯瓦特河谷

图0-3　白沙瓦博物馆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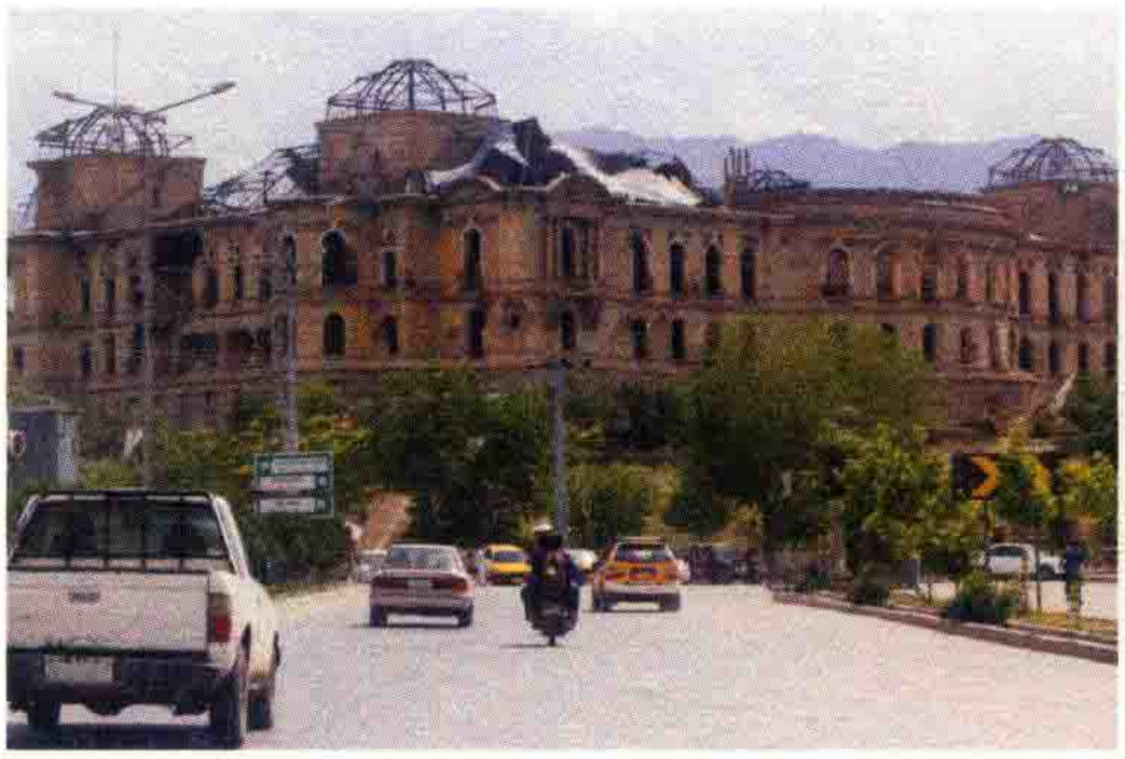


图0-4 a



图0-4 b



图0-4 c



图0-4 d



图0-5 a



图0-5 b

图0-4 a~d　喀布尔街头

图0-5 a,b　静静流经塔克西拉的哈罗河

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仅仅在塔克西拉地区的发现，就足以令人震惊。马歇尔爵士（Sir John Hubert Marshall，1876—1958年）凭着自己对希腊克里特岛挖掘的经验，为犍陀罗地区的发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汉文文献中的“怛叉始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分属三个时期的古城，包括皮尔丘（Bhir Mound）、锡尔卡普（Sirkap）和锡尔苏克（Sirsukh），都出土了大量改变历史图景的遗迹和文物。锡尔卡普的双头鹰庙，是一座佛教窣堵波；法王塔（Dharmarajika）和焦里安（Jaulian）遗址、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遗址等，见证了佛教在这里的繁荣景象。数量众多的装饰盘和多达四十多位的希腊君主的钱币，见证了希腊文化在这里跟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公元5世纪初，法显在这里留学六年之久；他的后来者玄奘大师也在此停留两年，可见这里在佛教世界中的地位。

犍陀罗在中文和西方文献中都留下了痕迹。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迦（Kanishka I）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早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已经听闻犍陀罗之名。甚至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商人和移民已经到达了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的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指的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是佛教的中心，这里“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造成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1]。

在犍陀罗地区，佛跟商业和都市的结合，让佛教从开始就跟富裕阶层结成紧密的联盟。物质的丰富给佛教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在苦行之外，供养和布施成为追求解脱的新法门。犍陀罗佛教文本如同图像一样，充满着对繁荣景象的描述：富丽堂皇的都市建筑、衣着华丽的仕女、喧嚣的街市等等。但是当被翻译为汉语时，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对比马鸣的原始文本和汉文译经，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犍陀罗曾经繁荣数百年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尽数化为泥尘，不复繁华。减掉这部分内容的描述，恐怕是担心混淆了译经的重点吧。可是，这些在当时的犍陀罗，正是重点啊。

1 桑山正进《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第83—93页。



图0-6



图0-7



图0-8

图0-6　白沙瓦街头

图0-7　骑车的少年，喀布尔街头

图0-8　拉合尔博物馆



图0-9 佛陀立像、塔克西拉博物馆



图0-10



图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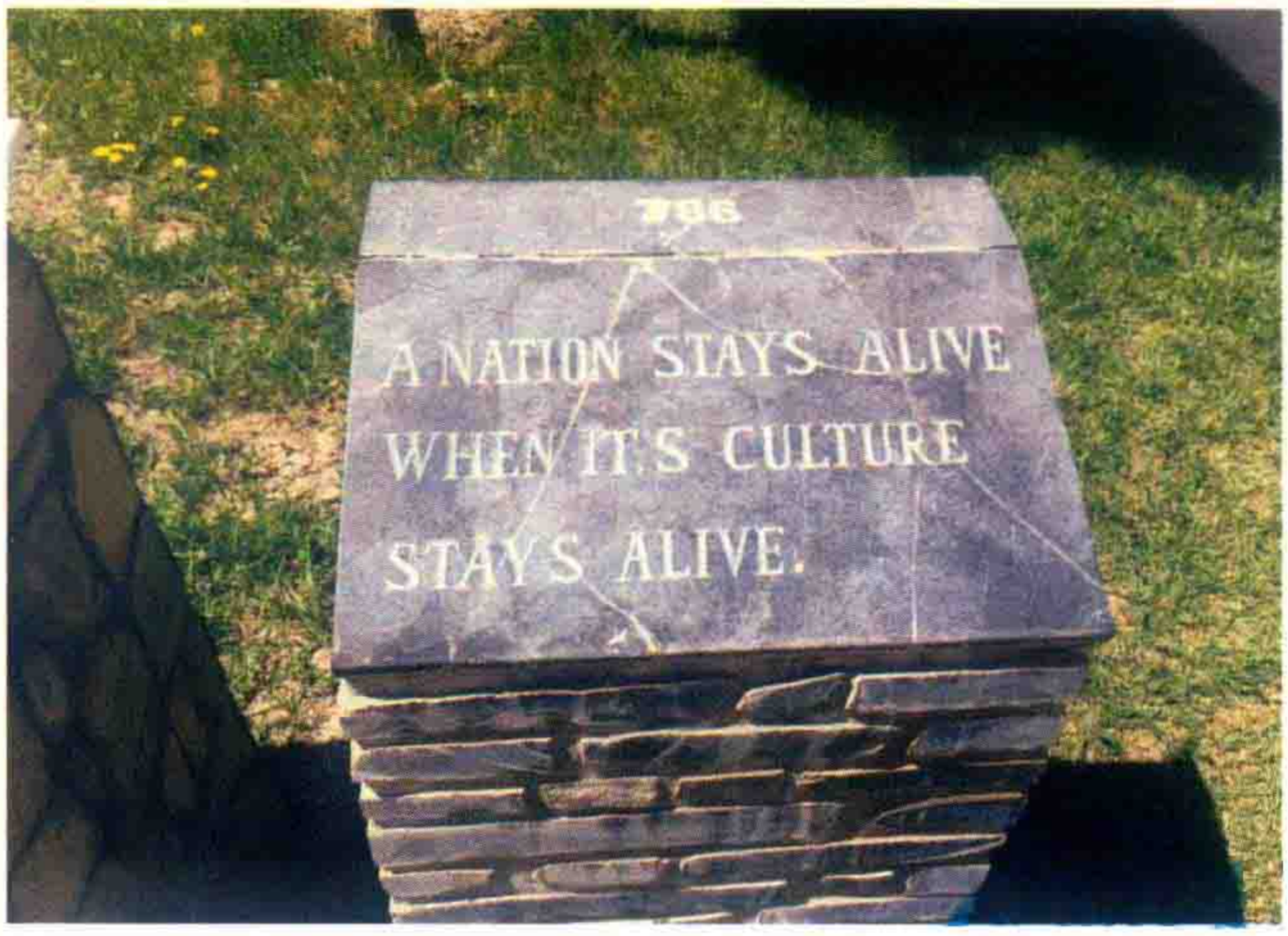


图0-12

图0-10　故阿富汗总统府

图0-11　故总统府前踢球的少年

图0-12　“文化存则国存”，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二　“退化”的佛教史

要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肯定不能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说起。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他们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那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乃至“迷信”相结合，呈现新的面貌。所以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这样描述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其实，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的规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便从佛教的立场看，佛教要保持活力，也应是一个常新的思想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根本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描述为一种线性的乃至退化的历史，是一种幼稚的对历史的误解。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因为政权林立导致的交流障碍，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迦等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名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

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如果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加进去，可能佛教史、中国史乃至丝绸之路的历史，都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同时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也是各大国纵横捭阖的征服和对抗之路。如果仅仅依靠我们已知的信息描述这条路，我们知道它肯定不完整。比如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1]，我们根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天才史学家对粟特历史倾注的精力和热情，恢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历史信息。

1 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英文版201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